

天津市古籍保護中心 工作簡報

第 三 期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编

2010 年 7 月 1 日

本期目录

- 承办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 举办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 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 李致忠先生作“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
-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专题古籍工作会议
- 古籍知识

一、承办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2010年4月6日至6月25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由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为期近三个月的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在天津图书馆圆满结束。来自全国3天津图书馆多个藏书单位的38位学员参加了培训班学习。这是继2008年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之后又一次承办此类培训班。

这次培训的目标是：根据全国各级图书馆藏书情况和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的实际现状，让学员初步掌握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本次培训汇集了一批从事多年古籍修复工作，具有丰富经验，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课程安排包括：李致忠先生讲《中国书史》，吴澍时老师讲《修复档案登记》，马国庆、冀亚平老师讲《中国传拓技术》，王菊华老师讲《纸张的科学》，张旺老师讲《纸质文献色彩理论》，万群老师讲《衬托拓片》和《古籍的装帧（新装）》、《古籍的修复及用纸》和《修复技法》，张平老师讲《浆糊的提取、纸浆补书机的操作》，潘美娣老师讲《洗书页、揭书页、染纸线绫等》，杜伟生老师讲《古籍装帧形式》，刘家真老师讲《古籍保护方法的选择与评价》，陈红彦主任讲《保护装具》和《古籍修复漫谈》。

本期培训班的学员以我国北方地区藏书单位为主，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北、河南、甘肃省，以及四川、湖南等少数南方省份。

作为承办单位，我们全力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组成服务团队，调动全国各有关部门同仁积极性，各司其职，认真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培训任务。

我们鼓励学员要把握这次难得的、面对面的专业学习和技能提高的机会，把古籍修复技艺真正学到手，满载而归。回去后把本单位的古籍修复工作担当起来，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保护、传承这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师生合影留念

二、举办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借这次在津承办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聘请古籍界专家学者前来授课的机会,同时举办了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主要是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文物与修复”专业的在校学生。



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师生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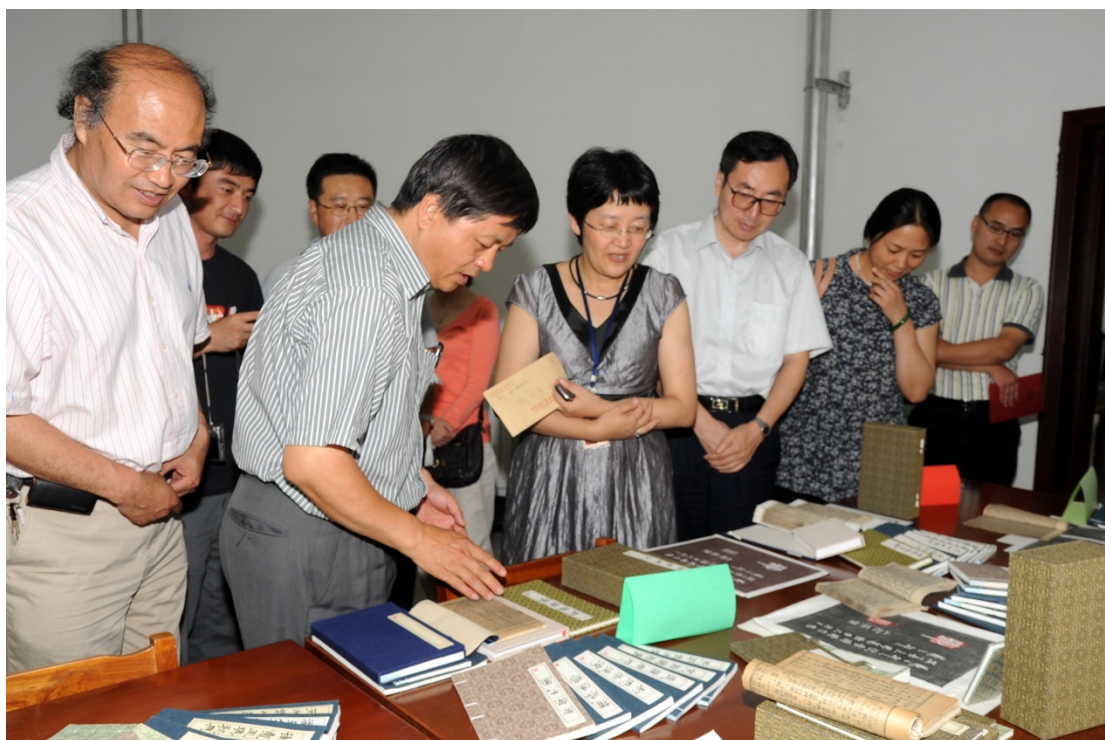
培训班学员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学习



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之一



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之二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陈红彦主任（左三）、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右三）、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张海涛副院长（左一）等参观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



天津市文广局赵洪友局长（左四）、天津图书馆党委李云华书记（左一）、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左二）参观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



天津市文广局赵洪友局长（右一）到天津图书馆考察古籍修复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陈红彦主任（右一）向培训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暨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结业典礼合影留念

三、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2010年6月28日至7月8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在天津图书馆圆满结束。来自天津市本地区20多个藏书单位的42位学员参加了培训班学习。

举办这次古籍普查培训班，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围绕古籍普查和编纂《中华古籍总目》进行培训。课程安排包括：李致忠先生讲《古籍分类与编目》，吴格老师讲《古籍著录规则》，李国庆老师讲《古籍分类款目组织规则》，罗琳老师讲《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

通过开班前召开的全市图书馆馆长古籍专题工作会议，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各馆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与工作任务，通过古籍专家学者系统讲解，通过学员认真学

习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达到了培训目的。为全力推行古籍普查工作，为顺利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结业典礼师生合影



天津图书馆党委李云华书记（右一）向培训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左一）向培训班学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

四、李致忠先生作“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应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邀请，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文献学专家，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先生于7月1日上午9:00——11:00在天津图书馆报告厅作了“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李致忠先生，是我国古籍界资深专家，在古籍保管、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极深造诣，颇有建树。曾提出的古籍“三性原则”，对古籍所具有的价值作了科学阐释，业已成为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华古籍总目》所遵守的基本原则，成为制定《古籍定级标准》的理论基础。著有《古书版本学概论》、《历代刻书考述》、《宋版书叙录》及《三目类序释评》等专著，发表古籍学术论文15天津图书馆余篇。

“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是针对传世古籍的版本进行鉴定的，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一次古籍专题报告。与专家面对面，聆听专家讲座，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李先生精彩报告收到广大文史爱好者、古籍收藏者及本馆读者的欢迎。



李致忠先生作“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五、联合办学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培养古籍修复专业人才。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提到的“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有关部门要制定规划，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修复机构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一批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籍修复人才”的精神，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经过多次协商谈，最近，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联合办学。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的各级图书馆除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等少数藏书单位有专门古籍修复人才外，其他各馆基本没有配备古籍修复专业人员，因此也就没有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其结果是藏书破损古籍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和妥善保护。这是一种普遍情况，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改变。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是一所老牌艺术院校，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目标，曾培养出一批艺术人才。该校设有多个专业。其中“文物与修复专业”中就包括了古籍修复内容。一方面，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各级图书馆存在古籍修复人才匮乏的实际问题；而另一方面，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面临着拓宽招生渠道的适时抉择，

也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寻求一条出路。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是一种强强联手模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了优势最大化。按照合作意向，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古籍修复专家，成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为学生讲解古籍知识、传授修复技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培养出来的古籍专业人才，输送到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的各级图书馆，以及有修复任务的其他地区图书馆，承担馆藏古籍修复任务。这是一种没有经验可鉴的联合办学模式，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思想，大胆实践，集中我们的人力、财力资源，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闯出一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的路子，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为天津市古籍保护工作上水平贡献力量。



图为天津图书馆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领导就双方“联合办学”问题进行座谈

天津图书馆领导：李云华书记（中）、李培馆长（左二）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领导：万镜明院长（右一）张海涛副院长（右二）

六、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专题古籍工作会议

2010年6月22日上午，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天津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召开专题古籍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来自天津地区收藏古籍的各级图书馆领导和古籍部门负责人。包括天津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塘沽区图书馆等17家单位，30人参会。会议由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主持，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金永伟副局长讲话。

会议主要主题：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编纂工作项目，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启动《天津市珍贵古籍名录》和“天津市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评审工作。

会上，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通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发的《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任务书及编纂工作计划，以及即将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的情况。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金永伟副局长讲话，重点分析、总结了近年我市参与国家古籍保护工作的优势和成绩，部署了今年要完成的几项重点工作，以及本市未来的古籍工作发展目标，号召各级图书馆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争取取得优异成绩。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李国庆主任具体介绍了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的基本思路，以及其他有关工作。

会上，各馆代表积极参加讨论，介绍了本单位古籍藏量、编目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成立古籍保护督导组，促进工作的进展，并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相互帮助。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天津图书馆，共同完成《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的编纂任务。



参加此次专题古籍会议的各级领导和古籍部门负责人合影留念



参加此次专题古籍会议的文广局金永伟副局长（右一）、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左一）

七、古籍知识

论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之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从先秦到汉初，我国在政治、学术上出现了不少学派，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等。各家的代表人物都被尊称为“子”，如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据《汉书·艺文志》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所以浑称“诸子百家”，是举成数而言。“诸子百家”既专指先秦诸子，也包括他们的学说。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各国都想立国称霸，而要立国、称霸，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治国之道。于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都纷纷提出见解，宣传游说，各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舌笔相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不

己的局面。

当时的主要学派大致分为九家：

(一)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个半神话或智慧人物，据说生活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做周藏室之史。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和社会人事的成败祸福，在《道德经》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否定上帝和鬼神的存在。“道”可以解释为客观的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有对立，才有变动。同时要意识到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故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及“柔弱胜刚强”之说。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有生于无”。这是老子学说的独到见解。还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论题，以表示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抨击。

老子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转化，却以为是简单地循环往复，看不到每一循环的过程是上升的发展，看到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却又错误地认为是智者出现和技术发展的结果。所以他深恶“淫巧”，主张“绝圣弃智”，倒退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状态。

稍后的著名道家人物是庄子(约前 369 一前 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著有《庄子》。文章汪洋恣肆，极富想像力，常以寓言故事的形式阐明哲学道理。

(二)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前 552 一前 479)，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为人勤学好问，而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苾弘，学琴于师襄。年长，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曾任司寇。后周游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而终不见用。晚年致力教育，相传他删《诗》、《书》，定《礼》、《乐》，删修《春秋》。有生徒 3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人，著名的 7 天津图书馆余人。孔子的言论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为《论语》一书。

孔子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接近于庶民，所以能看到民间的疾苦，主张“节用而爱人”，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在哲学思想上，孔子极力推崇“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在政治、教育、行为、人伦等各方面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就是在神鬼的有无问题上，孔子也持中庸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而是闪烁其词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种观点在中国 2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年的封建社会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孔子在教育上是有贡献的。他首创私学，收授门徒，并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他自己虚心好学，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治学态度是“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论语·子罕》)，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也有精当的见解。对待错误，主张“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在学术上他虽主张“述而不作”，但在制定六经时去芜存精，

也还是有取舍的，对保存古代珍贵典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孔子的学说中还包含着不少消极保守思想，如为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对“犯上作乱”，要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等等。

孔子之学，三传而至孟轲。孟轲(约前 372—前 289)，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是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战国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自任为孔学继承人。著有《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孟子主张“行仁政”，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提出“民贵君轻”，认定残暴的君王是独夫，诛独夫不是弑君。在君臣关系上，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承认有先天的“良知”、“良能”，但也重视后天的教育和自身的修养，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大胆发挥孔子及西周时“敬天保民”的思想，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但他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则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荀子(名况)虽承儒学，而其思想却有别于孔孟。他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他反对天命和鬼神之说，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并大胆地提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政治上，他主张礼治与法治结合，特别是他“法后王”的思想是对儒学的批判。

(三)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前 468—前 376)，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相传为宋国人，后长期居于鲁国。他出身于下层，自称“贱人”。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满于儒学，便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对立学派。墨家以“非命”和“兼爱”的观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主张不分贵贱亲疏，“兼相爱，交相利”，“赏贤罚暴”。他“非攻”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愿望；他“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他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牺牲精神。墨子认为要天下大治“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希望统治者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地位。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三表法”，即以前人经验、实验感知和符合国家人民利益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比之儒家强调“内省”更为深刻。

墨家的主要著作《墨子》是研究墨学的基本资料。

(四)法家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的重要学派。早期法家的先驱者有春秋时期的齐管仲(?—前 645，名夷吾)和郑子产(?—前 522，名公孙侨)等人。管仲提出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等思想对后世都有深刻影响。子产为郑“铸刑鼎”，公布刑法，整顿田亩，反对迷信，使郑国在“诸侯力政”的春秋能立身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实赖于子产治国有方。

秦国在东周时还比较落后，前 361 年孝公立，下令求贤。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后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应募入秦，实行变法，得到孝公的支持。他重编户籍、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法治，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理论，使法家思想臻于成熟与完善。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

和慎到的“势”三者合一，建立了以“法治”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这对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阴阳家

阴阳家的学说产生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中，由于对天象四时逐渐有所了解而形成了“五行”观念。即以金、木、水、火、土名五星，并用它比附地上万物，即所谓“五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又以五材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事物的变化。至周，人们开始用阴阳观念来解释四时的更替，后又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高度概括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并以阴、阳的交错配合来说明万事万物的不断发展变化。

到战国时期，随着这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产生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

邹衍，亦作驺衍，博学多才，尤长于天文、地理和历法。他把早期阴阳和五行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并加以附会扩充，成为阴阳五行理论。著《邹子》49篇，已佚。邹衍依据当时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经验，对天地起源和政权衍变进行臆测，扩大了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但他据五行生克所造出来的“五德终始”（如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循环论却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变化及各王朝的盛衰更替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而影响于后世。

(六)纵横家

纵横家，指战国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一些谋士。虽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实则不同于其他各家。他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夺取霸权的活动中应运而生的一批人物。他们的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也很讲究表达技巧，因而颇具说服力。但同时却往往出于个人目的，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取媚人君，以求显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战国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先后游说于周、秦、赵，都不受欢迎。当时秦势日强，使关东诸国大恐而谋求抗秦之计。苏秦有针对性地创合纵之说，先后说服燕、赵、韩、魏、齐、楚各国。佩六国相印，为约纵长，约定共同御秦之策。因此，“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张仪，魏人。曾受辱于楚，后入秦为相。推行有利于秦的连横策略，即说服六国分别与秦结好，使合纵终告解体。

苏秦有《苏子》31篇，张仪有《张子》1篇（天津图书馆篇），均佚。他们的思想缺乏中心主旨，只为谋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投时君所好，在各家思想中最为低下。

(七)名家

名家亦称“刑（形）名家”或“辩者”，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为主要内容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以及邓析、尹文等。其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除《公孙龙子》外，余皆早佚。名家诸子的观点，彼此不尽相同。如惠施代表性的观点是“合同异”。认为从宇宙万物总体来看，万物莫不“毕同”而又“毕异”，任何事物性质上的同异都可以在宇宙这个“大一”的范围内统一起来。这便是“合同异”的理论。它夸大了事物的统一性，但也看到了事物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含有辩证的因素，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公孙龙具有代表性的命题是“离坚白”。认为白而坚的石头，其“坚”与“白”不能同时存在。用眼看，看不到它的“坚”，而只能看到它的“白”，这时“坚”不

存在；用手触摸，摸不到石头的“白”，而只能摸到它的“坚”，这时“白”不存在。所以说“坚”、“白”是分离的。“离坚白”的说法，只强调了两个概念的差异，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

名家的理论包含着某些辩证的因素，因而有其可取之处。但有些观点则难脱诡辩之嫌，如“鸡三足”、“白马非马”等。

(八)杂家

杂家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折衷和糅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点。代表作是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吕不韦(?—前235)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与秦庄襄王交结而任秦相。他组织3000人汇集先秦各派学说，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诸家，故称杂家。西汉时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编纂的《淮南鸿烈》(唐以后始称《淮南子》)，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也杂糅了儒、法、阴阳诸家的学说，故列入杂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保存了先秦学术思想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除上述八家外，还有农家、小说家，合成“诸子十家”。十家之外，还有兵家、医家以及非墨的杨朱学派等。

各家代表人物影响较大的有近百家之数。他们各有一套自以为可以安邦济世的理论，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驰说诸侯。一方面大力宣扬和推行本学派的主张，一方面驳斥其他学派的“谬说”，形成了争鸣的局面。加上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封官赐爵者700余人，并在齐的稷下设“稷下学宫”，招揽各学派学者数千人，当时著名的即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接予、慎到、宋研、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他们各抒己见，自由争辩，使当时争鸣的形势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目不暇接的空前繁荣局面。

当时儒家声势甚大，墨子首先起而反儒。他以“兼爱”反对儒家“亲亲有术”的等级制度，以“非乐”、“节葬”反对儒家的繁缛礼乐和“贪于饮食，惰于作务”的不劳而食的思想。说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其道不可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对儒学的理论予以批驳。对孔子本人也大大加指斥，说孔某剥下人的衣服换酒喝等等。对孔丘弟子也大张挞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矜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等等。

庄子对墨派的学说也不以为然。认为墨子的主张“其行难为”，“不可以为圣人之道”，而墨子的理想必将“求之不得(不能实现)”。

杨朱反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主张“存我为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孟子则极力维护儒学，认为杨、墨之学是对儒学的一大威胁，因而大事攻击。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农家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抹煞了必要的社会分工。孟子对此痛加驳斥，强调一人不可能兼百工之事，因此也不可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治理天下之事。

荀子曾对12位有影响的人物逐一批驳。认为子思、孟子歪曲了孔子的本意来骗取群众；墨子强调实用、节俭而轻视等级；法家的慎到能制定法规而不能落实，无力治国；批评名家的惠施、邓析提出一些奇怪论点进行诡辩，也不能用它维护社会伦常秩序。庄子除推崇老子和关尹外，对名、法各家都有所批评。韩非认为当时众说纷纭只能蛊惑人心，从根本上否定了诸子的争鸣，以求法家的独存。

其实，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后世学者做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如《吕氏

春秋·不二》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都有较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独取法家思想治国，实行严刑峻法。由于正统儒派的抗争，而造成“焚书坑儒”的惨剧。

儒学经过一番厄运之后，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它在本质上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改造，吸收道家哲学及阴阳五行思想，突出宣扬“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武帝断然罢黜百家，儒术被捧上了独尊的地位。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不断按自己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改造，也始终以儒学作为维护统治地位的理论武器。

道家的影响也延续久远。汉初“黄老之治”，魏晋的玄学，是道学的显赫时期。特别是到唐初，老子被冠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在政治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后来标榜的道家，多侧重于“清静无为”的消极方面。道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方面变成了完善儒学统治术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它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是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得到世代继承的。

法家的思想在秦得到了完善和实现，其中不乏有效的治国之术，所以以后历朝历代都不可能弃而不用。汉代“独尊儒术”，实际却以儒法相表里便是明证。

阴阳五行说，起初有其科学价值，自演变出“五德终始”说之后，再经后世文人不断加工，则变成一种近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理论，统治阶级更利用其“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合法统治的理论依据。

诸子百家之说，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各有其变化和兴衰的命运。但各家之说的关系正如班固所言是“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历代统治阶级正是不断吸收各家之长，以完善自己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也便深深影响于人民大众的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演进，诸子百家的界限益趋模糊。然而对各家思想的研究代不乏人，因而各学派思想的流风遗绪不绝如缕。

儒家既得独尊之位，其著作之流传自是名正言顺。不仅孔子删定的五经，连记录孔子及其学派诸子言行的“四书”也都被官方指定为必读经典。自汉至民国有关阐释《论语》的书约有3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种之多。其中有名的注疏本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员的《论语正义》、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孟子》有名的注释本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等。其他如《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各家著作，后世也多有注本和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人们很早就注意收集并开始著录。子书的范围是“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也就是说，把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都列入子部。西汉刘歆《七略》始立“诸子略”一类。《汉书·艺文志》依《七略》之旧将诸书分为十家。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乙部即收录子书；东晋李充更定甲、乙、丙、丁排次，子书归为丙部。

《隋书·经籍志》则正式以经、史、子、集命名四部，千年以来相沿不改，子书成为中国文献一大类别。但后世子部界限日趋庞杂，如《四库全书》将难纳入经、史、集部的书统统归入子部，使子部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除诸子百家之外，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均归子部，共14类25属，甚至命书、相书、器物、食谱、鸟兽虫鱼、杂事、杂品、异闻、琐语等亦被塞入其中，形成了凌乱不堪的子部。与最初的子书概念已相去甚远了。

秦汉以后，由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延续、发展，产生了像汉王充《论衡》、晋葛洪《抱朴子》等一批新的子书，也出现了像今本《列子》、《晏子春秋》等一批自称“古本”的伪托之作。这些时人均列入子书。

为便于保存和查阅，明人将子书辑为多种丛书。仅嘉靖年间的诸子丛书就有《十二子》、

《六子全书》、《六子书》等。其后则有明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收 93 子)、清崇文书局辑《子书百家》(一名《百子全书》)、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子书二十二种》、民国时五凤楼主人辑《子书四十八种》等。而影响较大的是民国国学整理社辑的《诸子集成》(1935 年世界书局排印本)，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近年数家出版社均有影印出版。